□ 通讯员 吴建波 吴粤 记者 徐荔

一次本该充满欢笑的旅程，却遭遇飞来横祸。网约车撞倒了路边的信号灯柱，恰巧砸中人行道上的孩子，孩子身受重伤，不幸去世。无证的司机、车辆所有人、保险公司、网约车平台，谁应当承担这笔赔偿呢？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法官的释法说理下，各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，保险公司赔偿18万余元，网约车平台赔偿160万元。

孩子遭遇不幸 赔偿应该由谁来担

2023年7月，小常满心欢喜地跟着父母来上海旅游。一日晚上，结束一天游玩行程后，一家三口正步行回宾馆休息，突然一辆小轿车冲了过来。事发时，小轿车并非撞向他们，而是朝着路边的信号灯柱撞去，信号灯柱被撞后倒地，将小常和他的母亲砸倒在地。小常母亲受了轻伤，小常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。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认定，涉事车辆驾驶员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。随即，余某被刑事拘留。

据了解，涉事车辆属于余某的丈夫沈某，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。事发时，余某正在某网约车平台接单运营。然而，余某并无网约车驾驶运营资格，涉事车辆也没有营运车辆资质，属于无“双证”的违法运营。于是，小常父母将余某、沈某、保险公司、网约车平台诉至法院。

小常父母认为，余某作为涉案驾驶员，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；沈某作为车辆所有人，明知余某及车辆无营运资质，仍放任余某使用车辆长期进行营运，应承担连带责任；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应承担赔偿责任；网约车平台没有尽

到监管措施，应承担连带责任。小常父母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197万余元，保险不足部分由余某、沈某、网约车平台承担连带责任。

余某辩称，涉案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，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进行赔偿。沈某表示，他作为车辆所有人，并非驾驶员，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，不应承担责任。保险公司则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，但由于涉案车辆从事运营活动，但投保的却是普通车辆的三者险，因此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。网约车平台则认为并非该侵权人，事故发生与网约车平台无关，不应承担责任。

庭审过程中，被告各方唇枪舌战。作为原告的小常父母看着这一幕，五味杂陈，对他们而言，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可爱的孩子，小常的母亲崩溃痛哭。主审法官见此情景，宣布休庭。

法官释法说理 网约车平台赔偿160万

庭后，法官再次联系余某及沈某的代理人，代理人表示，余某目前在服刑中，她清楚知道自己应该赔偿，但实在是无力赔付。而沈某

被撞倒的信号灯柱 砸到无辜孩子后……

表示会积极为妻子筹措赔偿款，但是他们的支付能力也无法让小常父母尽早获得全部赔偿。

保险公司代理人表示，保险公司也十分同情小常父母，已在交强险范围内支付了全部交强险限额，但营运车辆购买的是普通商业三者险，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而网约车平台代理人则表示，网约车平台最多承担补充责任。于是，主审法官释法析理，告知以家庭自用车辆投保后从事网约车营运，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，在营运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，保险公司可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主张免责。因此，该案中，保险公司仅需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。

而网约车平台应当保证提供服务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，具有营运车辆相关保险。若平台没能尽到法律明文规定的车辆保险的审核职责，致使未投保营运类保险、且本不应用于营运的涉事车辆通过平台审查并通过平台对外营运，最终造成人员伤亡且在事故发生后无法通过保险及时理赔，平台应对此负有责任。

没过几天，网约车平台代理人致电主审法官，表示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，并且肇事司机余某已在服刑，网约车平台同意承担合理的赔偿金额，并且会尽快履行。

2024年7月，在黄浦法院的主持下，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协议，保险公司向小常父母赔偿18万余元，网约车平台向小常父母赔偿160万元。在小常一周年忌日之际，该案成功调解，终于让小常父母有了一丝慰藉。

说法 >>>

随着网约车逐渐兴起，网约车及网约车平台运营的合法合规问题也日益凸显。司机需要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，所驾驶的车辆使用性质应为预约出租客运，并且需要投保营运车辆商业三者险。

网约车平台应当对平台内的驾驶员及车辆资质进行审核，确认驾驶员、车辆及保险均符合法律规定，才能让车辆在平台内接单。规范网约车的运营，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；即使事故发生，也能使后续赔偿工作规范有序。

受伤后签“私了”协议 出尔反尔又索要17万

□ 通讯员 袁倩茹 徐媛媛 记者 徐荔

当意外来临，“私了”看似可以一劳永逸，背后却潜藏着和而不懈的隐患。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，签订赔偿协议后的一方当事人就出尔反尔了……

案件回顾 >>>

2023年4月，大力经人介绍到小李处，后被小李安排至工程项目工作。同年5月，大力从自行搭建的高约1米的手脚架上摔落受伤，被诊断为右侧根骨骨折，并进行了相应复位内固定手术。事故发生后，小李为大力垫付了医药费，并聘请了护理人员，共花费5万余元。

2023年6月，大力找到小李协商赔偿事宜，双方签订了《赔偿协议》，小李承诺除垫付款等已支出费用外，另行一次性赔偿大力7万元。大力承诺收到赔偿款后，不再以任何形式和理由主张权利，衍生结果自行承担。

然而，一个月后，大力认为《赔偿协议》显失公平，诉至法院。大力诉

称，签订协议时，他还没有进行伤残鉴定，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，且迫于在外打工着急回家和维持生计，这才签订明显低于自己实际损失、显失公平的协议。他要求撤销《赔偿协议》，要求小李再行支付赔偿款17万余元。

小李则认为，大力是自行从手脚架上跳下才受伤，没有尽一般注意义务。而且虽然伤情未经鉴定，但大力就诊时便知晓医院的诊疗意见，后来是他主动找自己签订《赔偿协议书》，并不存在阻碍大力判断的危困情况。小李认为自己已按约赔付，所以不同意大力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青浦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该案焦点在于《赔偿协议》能否因显失公平而被撤销。从客观事实来看，一方面大力主张的护理费、伙食费、误工费的计算标准超出了合理范围。另一方面，大力主张的损失赔偿金额并未考虑过错责任的合理分担，因此他的实际可得损害赔偿在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后，与小李已经赔付的12万余元并不构成显著差距。从主观事实来看，大力有充分条件和时间做出符合

自身利益的意思表示，自身的危困情况和判断力的缺乏对其提出合理要求并不形成障碍。

最终，青浦法院判决驳回大力的所有诉讼请求。

说法 >>>

● 签订赔偿协议就能“一劳永逸”？

一般情况下，一次性赔偿协议具备民事合同的属性，属于各方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身民事权利的正常处分。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经过平等协商自愿达成赔偿协议，且协议不损害国家、集体、第三人、社会公共利益，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，该赔偿协议合法有效。

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后，也可能和而不懈，从而产生后续纠纷。想要避免后续纠纷，对于赔偿权利人，一方面要在一次性赔偿协议问题上保持审慎的态度，要合理预估自己的损失；另一方面，一旦达成的协议合理公平，也要遵循诚信原则，契约精神，切勿出尔反尔，企图“狮子大开口”。

对于赔偿义务人，要恪守公平原

则，不趁人之危，积极履行赔偿义务，填补对方的损失。

● 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实际有出入就可以撤销？

答案是否定的，约定赔偿与可得赔偿的数额差距、受损害方对伤残情况的认识、签订协议时的紧迫程度等因素都应综合考量。

对于构成重大误解而言，判断核心在于主观上“损害是否可预见”与客观上“利益分配差距是否重大”，一般只有在赔偿权利人经后续检查鉴定发现伤势较重，伤害程度超出订立协议时的合理预计范围，因此导致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实际可得损害赔偿有差距，且为重大差距时才构成。

对于构成显失公平而言，判断核心则在于主观上“赔偿义务人是否有利利用对方劣势的故意”与客观上“利益分配是否显著失衡”。一般而言，赔偿权利人在签订协议的当时，处于急需金钱等危困状态或缺乏专业的判断能力，易迫于情势签订明显不利于自身的赔偿协议，导致获赔金额不公平，且差距显著时才构成。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